

刘醒龙

LIU XING LONG

· 中国当代作家丛书
集丛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刘壁龙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醒龙/刘醒龙著 .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5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ISBN 7-02-002744-X

I. 刘… II. 刘… III.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7814 号

编 选: 胡玉萍

责任编辑: 胡玉萍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59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5 插页 4

199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20.50 元

乡土是一杯酿制多年的陈酒，舍不得一口饮了它，惟恐难再。于是乡土就成了离乡人的难解情结。隐着乡情的苦难也好，隐着苦难的乡情也好，那份眷恋，那份不舍，那份痛得揪心爱得也揪心的感觉，总是如醍醐灌顶一样，让人酣畅淋漓之后，视乡土为迷离中的又一家园。

刘醒龙



作 者 像

凤凰琴 (小中篇小说)

● 初醒龙 —— 韩

132
2312
138

阳历九月，太阳依然没有回忆起自己冬日的柔和美丽，从一出山起就露出一副让人急得浑身冒汗的红彤彤面孔，~~那种格不知耻的船样~~一直傲慢地悬在人的头顶上，终于等到它从落山了时，它们要伸出半轮舌头将天边舔得一片猩红。这样，被烤熟了的境子才从迷糊中清醒过来。一只狗黑溜溜地从竹林里撵出一群鸡，一团团黄蒙蒙惊得满院咯咯叫，暮归的老牛不满地哼了一声，各家各户的烟~~面~~赶紧吐出一团黑烟。黑烟翻滚得很快，转眼就上了山腰，而这时的烟圈开始徐徐缓缓地晕染起一串清云。

图

手迹

出 版 说 明

为了展示建国以来文学创作的实绩，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我们陆续编辑出版“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这套丛书，拟选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学创作上做出重要成绩的作家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代表作（包括儿童文学创作），每人一集，每集大约二十五万字，并附有作家照片、手迹和主要作品目录，以便与我社同香港三联书店合编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相衔接，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丛书。读者从每一集里，可以看出某一作家的基本创作面貌及创作实绩；各集合在一起，大体可以总览我国当代文学创作（长篇小说除外）的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

心如明镜台(代序)

周 肖

记得是在一个假日的晚上,朋友的聚会风流云散后,深夜回到家里摁电视,摁出来的是一个《凤凰琴》。

别的频道正在播一部外国电视剧,声调优美,色彩华丽,对比之下,《凤凰琴》无论哪儿到哪儿,都透着贫穷。当时的心境,贪恋着繁华,不接受这刺眼的景象,遂把着个遥控器频频更换频道。最后怎么定在这个节目上,一直看到结束,现在也想不起来了。

只是记得结束那当儿,看着小张老师转过盘盘曲曲的贫瘠山道,回头去看已看不完全的界岭小学,心里突然咯噔一下,就呆在那里了,说不出话来。看不完全的界岭小学,看不见的余校长、孙四海、邓有梅,似乎都已得庄严菩萨像,超脱而去,现在轮到小张老师独自下山,去修炼他未满的功业去了。

回头念及在万事中挣扎的自我,正是被余校长他们打发到尘世中来的小张老师,泪水不由得一下就下来了。还未及成形,却又爆发出抑制不住的笑声来。因为想起刚才的聚会上,我们那一群没有房子,住单身宿舍、单人床的朋友,一个画油画的姑娘在抱怨,两个人睡单人床,弄得她经常睡梦中一翻身,就在旁边的书桌上撞出个大青包来。一笑一哭都收不住,在记忆中是惟一的一次。不过到最后,哭和笑都风流云散了,心里是无声的感动和安慰。其实要准确地描绘当时的感受,得用一个已比较

稀用的词：升华。

因此，今天择其要点的评述和联想，也许都可看作那个晚上的延续和对《凤凰琴》的报答。

江汉一带的写实风格

尽管写实一直被作为一个时间性的概念来描述某一阶段中国文坛的整体走向，我还是认为把它老老实实地交还为一个地域概念更为“写实”。

几乎不用更多的思考，凭印象就能看出，江汉一带的风土在滋长、培育着一种近似的写作风格，池莉、方方、刘醒龙、邓一光……这些先先后后的作家作品，合在一起，能比较出和江南丝竹繁弦般的“写实”、中原神话寓言般的“写实”的差别。江汉一带的作品，更为老实地呈现着“写实”所要求的分类学上的特征——他们留意所见到的一切东西。

与他们同时不同地的伙伴相比，显得更开放没有结论，更复杂而缺乏一些简洁的抒情感染力，也许还更粗糙，但却以一种有时令人茫然失措的方式让同时代人感到忧戚相关。《凤凰琴》之前，刘醒龙那种对生活事务化的描写及事务化的描写方式并未引起我更多或更深的注意。实际上，刘醒龙的小说中缺乏突兀的玫瑰花般的形象，也几乎从不营造什么弥天大雾般的氛围，换句话说，他的作品缺乏能让我们这个时代的读者容易感到认同的主观性或个性化特征。我想一直到通过《凤凰琴》，刘醒龙才获得了足够的力量来让人注意他的追求和努力。可以说只有在刘醒龙及江汉一带作家的作品里，我们被提醒，想起了一种朴素的信念，那就是对人和人关系的信念；在他们那里，人和人的关系既没有被简单地否定，也没有被简单地肯定。他们只是认为，

不管肯定还是否定，都必须发生在人群之中。

《菩提醉了》、《秋风醉了》这类以官场进退、利益得失为题材的作品是刘醒龙作品中常见的一部分，用官场来展示人性异化的作品，我们其实已见得不少，刘醒龙的作品最容易让人感到和这类作品的接近。但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即对复杂世界的感受是第一位的。权力的得失尽管重要，也是主人公行动的线索，可是作为写作对象的主人公又常常显得怀有比获得权力更大一些的目的，即“求知欲”：认识权力、了解权力。很难说有单纯的失败者或单纯的成功者，主人公用切身的经历在展示人在追求权力的同时，权力也作为客体对人进行需求、掠夺、取舍的“知识”，这让刘醒龙的主人公常常在失败时少一份绝望，得到时也没有庸俗的狂喜，在最困苦处也显示出对待权力的一种非功利态度，对待既成事物的一种尊重。

如果不了解这种信念所置身其中的大的背景，可能很难理解坚持这种信念的特异和危险；可以说我们这个时代所有优秀的作家，都联合在共同维持对人与人关系的警惕，特别是对现实关系的警惕这条战线上。一方面，是历史的教训，我们有着对放弃个人立场、放弃个性的漫长记忆；另一方面，是现实的与人联合的市侩性令人感到恶心。当然，在这两者之外，还有着作为创造性和本质自由存在的人对公众性本能的反感和反抗，而在这些情感的共同作用下，现实的人与人关系被有意地排斥和忽略了。即使还有——像在刘震云等人的作品中——它也是作为被整体否定的对象而存在的。其实，一旦当现实作为整体被否定，它就已经改变了性质，变成了精神活动的产物，在它被表现的那一时刻，它同时已丧失了作为精神活动二元对立一方的性质——这也就是我们已经习惯的接受和面对现实的一种

方式。

不过，这既是我们所习惯的方式，却也是我们所习惯怀疑的方式，个人精神的阅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突破了个人的限度，而包含了其他或整体？个人的精神阅历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信赖？人和人的关系，像一个黑暗的怪兽，隐性地存在于我们精神前进的路上。

如果要给“市侩”下一个定义，那我认为应该是：它认为所有问题都是可以通过人和人关系的努力而获得解决和改善的，它将人和人的关系看成了被某种简单原则所约束的有限体，不承认精神的内在性、不可沟通性及世界的无限性。

刘醒龙行走于现实却未被市侩气污染和淹没，我想是缘于他的写实对现实整体所作的突破工作：现实也许是一个整体，可是这个整体比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个要大得多，复杂得多，可以说是无限的。“无限”这一概念作为基本背景在作品中的引入，是江汉写实的珍贵独有之处。

在《暮时课诵》一篇里，刘醒龙曾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地区财政局几个小青年，一男二女，个个都有点闹家庭矛盾的意思，相约着到附近山里的灵山寺去春游。灵山寺香火有些败落，几个没受戒的老尼姑嫌给的钱少，敲磬问签时也没给好脸色。幸好灵山寺旁有个灵山林场，林场的人为贷款的事好好招待了他们一番；但林场的饭刚吃罢，寺里的慧明和尚来了，弯腰作个揖请他们回去，重新打了一堂佛。做完法事，却眼睁睁看殿前闹了一场事：一个中年男人在佛前毒打他女人，为的是她把钱都拿来捐了功德，女子却任他怎么打，只忍着不在菩萨面前发悲声。正不可开交时，听见殿后面传来一声：“阿弥陀佛！”声音虽低，但强烈得像空山里的回声。慧明说：“显光师父往外一站，我就觉得自己连糠秕都不如。”三人留在寺里吃了一餐斋席，说定了以保护

舍利子为理由向财政局贷五千元款的事。这一趟春游，仿佛谈定了两笔贷款，三人中还隐约滋长着一些情愫。可是回来后，事如春梦了无痕。两笔贷款都不用了，显光师父来了个大动作，把寺里偷闲耍懒的人都撵跑了，将积蓄的二十多万元借给了林场；一个似乎要发展起来的婚外恋也在女子“你的胆子只有芝麻大”的怨声中收了场。

整个故事由“如是我闻”、“如是我见”的方法串成一线，刘醒龙不动声色地就涉及了凡间、佛门、情欲、信仰，官僚机构、计谋、特异功能等题材，在凡俗的画面和凡俗的叙事中，又不弃不离、互相挟裹地呈现着善意和信仰。在这篇小说中，很多地方都可看成小说的“非本质成分”、“非主流因素”，像法殿上的那场大闹，善女人的朴素坚韧，三人欲进不进的暧昧关系等，但又几乎没有一个可以看作题外之话，事态中的因果含蓄隐藏，几乎不是凡眼所能窥探。刘醒龙在“留意一切”的叙事中，用多重因果的叠加，构成了一个不做交易的世界。

大约是在张爱玲《倾城之恋》之后，那种“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城市都倾覆了”的轻佻的因果论甚为流行，本来要说的无常，失去广阔深邃的内涵，变成逃脱责任、自我欣赏的戏话而已。像刘醒龙这种对复杂因果的尊重、谦逊已很难见到，他的好多作品都像是对那种简单因果论的逆反。

说起逃脱的这个责任，不是哪个要救国救民的责任，而是人作为智性生物对自己“智性”的责任。人如果不努力去认识世界，去思考命运，只是过一种“不问也罢”的日子，怎能说不是残缺的人生与人性？

世界已经太复杂了，复杂得缺乏任何现成的逻辑，并由于这难以把握的复杂，世界正在摆脱我们，离人远去，这是刘醒龙大部分写作时面临的基本背景。因此，刘醒龙的作品常是关于“事

实”的作品，同时又是关于“无限事实”的作品。他只有靠一种实际的行动去努力抓住这世界，再能考虑从其中去吸取营养，决定取舍。这就构成支撑江汉写实的一种罕见的写作动力——求知欲。

世界是人和人组成的，人也是人和人组成的，即使这关系已经变得令人绝望地纠缠、陌生、远离人的理想，但是离了它，一切却都无从谈起。所以，首要的就是：认识这世界。

美学显然不是写实者们追求的目标，他们是想用写作来认识世界。刘醒龙用写实压抑提问，压抑对个人抚慰的窃窃私语，推迟人精神的对象化：如何提问？如果不充分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的问从何来，问又何益？如果我们不在各条路上都认真地走一走、试一试，怎么说得出什么是真正的精神危机？

这种风格不断唤起我内心一种难言的心痛感受，提醒我想起，生活在此时此地的中国，我们最为深刻的精神困难就是“认知”的困难。我把它称为困难，而不称为悲剧，是想突出这种精神状态的客观性，尽管这困难也委婉地表达着认知过程中精神所遭受的情感摧残。近一百年来，我们祖先拥有的认知体系瓦解了，新的认知体系有待建立，在对权力的严酷服从和对生存的荒凉追求中，人的内心世界只渴望着抚慰。我们确实也有了各式各样的抚慰：英雄主义的、理想主义的、遁世的、感伤的，但有一个地方是空白：认知的世界。抚慰是发生在个人领域之内的精神活动，开始于个人，亦终端于个人，它无助于建立任何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只有认知的力量才会有助于正视和建立这些关系，而我们却恰恰缺乏真理性的认识，由此整个内心变得悲屈不伸。我们在一次次地付出感情、消耗感情之后，世界反而越来越陌生，人也越来越孤独。我们认识这个世界吗？我们的悲惨的、过于庞大的生活究竟是被什么力量支配？

若要追溯这整体风格的缘由，我只能找出这块土地上曾生活过的先人屈原，他的《天问》就是这样叫着天的名字、地的名字，叫着日月星辰，叫着世间万物，要问出个道理来。屈原的作品繁丽幽深，同样具有分类学的色彩。百代之后，这块土地上的人似乎是没有选择地承袭了他，身备万物方谈自由，认识世界解脱忧愁。

善与普通人的超越

能够毫无矫揉造作地描写善，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一桩奇迹，而刘醒龙又一再地显示了这个奇迹。《村支书》、《白雪满地》、《凤凰琴》、《孔雀绿》等一系列作品中都留下了善的印迹。刘醒龙打破了善的囹圄，打破了善是一种特殊的人格境界、常混同于英雄行为的习惯做法，将它扩展为我们这个无边人生苦苦思辨所能得到的惟一正果。

在因果混乱的世间谋求生存，这并不是刘醒龙一个人才有的认识，只是《凤凰琴》带给人的悲喜交集昭示了刘醒龙显然走着一条与众不同的超越之路，并且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条新路。

星期六的下午，是各位老师分头送学生回家的日子。那一天老师自家返回的时候，却各自演出了一场场险情。邓有梅撞着了一群狼，狼群迎面冲来，吓得他不知所措，站在路中间一动也不动，“那狼也怪，像赶什么急事，一个接一个擦身而去，连闻也不闻他一下。”余校长却遇见了鬼，“送完学生天就黑了，路过一个田垅，明明看见一个人在前面走，还叼着一支烟，火花一闪一闪的，他想走快几步撵个伴，到近处，一拍那人肩膀，觉得特别凉，像石头，他仔细一打量，果然是块石头，不仅是块石头，还是块墓碑。他心里一慌，脚下乱了，一连跌了几跤，将膝盖摔得稀

烂。”等到大家惊魂未定地聚在一起，各说各的，说到底，大家都笑了。一个说遇到狼没被吃掉是“穷光蛋也有个穷福分”，一个说山里遇鬼是常有的事，不用大惊小怪。

这场经历似乎已暗伏了后来余校长、孙四海、邓有梅统统得到解脱的玄机。在惊险危难、怪状迭出的情况下，每一种抒情的倾向都还是被抵制了，没有得出任何个别性的结论。大家的结论其实都没对事件本身作出推理、解释和解决，有一种品性在根子里要求人与种种惊险危难、与理性或迷信、与公平或不公平、贫穷或繁华“共存”，这样的品性，才是善，善完全正视人自身的局限同时也正视人可以尽大可能地容纳万物的无局限。

善不是特殊性，善是容纳普遍性的普遍性；善与知浑然一体，标示出一种心的境界——“心如明镜”。心温润、明亮，印证万物而保有自身。这让我大胆猜测，善是人类从原始思维到启蒙时代的产物，在这一时期，人类还朴素地保存着对知性的信仰，而当人们不再起码地信仰知识时，善意也就失落了，或者难免地显得做作。

知性对善的介入而出现的“心如明镜”这境界，颇让人想起一句被人列为次等的偈语：“身为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由于有一句比它高明的“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它的意义常常韬光不显，其实我倒愿意将一看为过程，一看为结果，如果没有“时时勤拂拭”哪里来的“本来无一物”的清明天地呢？“明镜亦非台”只不过是说打扫了追求之心后，镜与万物宛然自现的客观状态罢了。

有时能感到，刘醒龙自身的写作行为就是对善的实践。文中人物的善意是通过与刘醒龙的写作相辉映相交织而存在的。刘醒龙对复杂世界的描述不是要得出复杂的结论，而是通过对它的复述来进行对它的探索，他是在锻炼“时时勤拂拭”的能力，

考验这能力能否穿越那异常复杂的迷宫。

刘醒龙将自己放逐到这复杂世界中经受考验，形成他作品中始终能让人感受到的一种独特的人性力量，尽管这人性是以服从、无言，甚至无形的方式来表达的。刘醒龙的写作像一种苦役，还有点像修炼，在他做得不够好的时候，还会给人碎片充满的印象，一点也不聪明；可是他用这种不聪明维持了对这个世界的不理解，维持了自己的立足点，实际上又是维持了对这世界保留批评可能性、保留超越可能性的权力。

由《凤凰琴》带来的温暖和感动是长久的，因为这一时刻将在一个更广大的经验整体中保存下来，它不仅保存了自身，同时还唤醒了这个经验整体，将它拖入到一种深沉的感情状态中。这个经验整体无以名之，暂且将它称作“普通人状态”吧。而在这之前——也许还不仅对我个人而言——这一经验领域是废墟，已长久被忘却。

在别人的作品（包括许多优秀作品）中，受到鼓舞的常常是某种特殊性；冲破令人窒息的混乱，靠的是才华、灵性、特殊的经历与遭遇，人们依靠对生活作新的解释和批判，或依靠对特灵性的炫耀性表达，来企图超脱生活；而刘醒龙显示了完全相反方向的一种态度，他不在写作中放纵情感、想象，不要求从生活中获得本来没有的东西，他的所有写作都在向我们表明，人只能依靠最基本的东西，依靠最普遍地存在于人身上的善根才能得到苦难人生的解脱。

不得不再一次地面临这个问题：个性与普遍性在我们这个时代显示出怎样的诡异的循环关系。文明的前瞻性已让我们对整体的命运怀有如履薄冰的顾虑，如马尔库塞在《单面人》中所说，一方面，“技术文明既不靠压服，也不靠劳动的冷酷，仅靠作为纯粹工具的地位就把人降到物的地位”，剥夺了人个性和创造

性的存在,但另一方面,“这个社会每日为它的效率和生产所宽恕,已经取得了超人的力量,它同化了它的对立,同化了它所接触的一切,以玩弄矛盾来证明其文化上的优越性”,每一种个性表达都可能因其被包容而失去真正的理性和力量。这种双面的难境让个性处于进退两难的维谷,我们在坚持个性立场的同时,又不得不在内心追问,个性能带领我们走多远?它能否真正带领我们晋升超越之境?

在这种情况下,刘醒龙走的无疑是一条危险的“反其道而行之”的路,他不朝特立独行的高峰寻问,而是到众生中求解,以坚固不坏的善意来容纳自相矛盾的整体,在最困苦处也始终不放弃对人类总体超生、人人皆有佛性、与人可以沟通的希望。说到这里,遗留下的问题已经不是刘醒龙的了,问题在于,我们,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接受这一切,接受他人,接受沟通的可能性?

“普通人”也许应该包含着这么一连串的意义:生活是有意义的,生活中有我们值得为之生活的终极目标——解脱,不论处于什么样的世界,这目标不变。解脱,最终来自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庞大复杂的现实的清醒认识,来自于对这庞杂的忍受和体会,还有,保留着被无限所没有亦不能消耗掉的心灵之爱。

贫穷:欲望的本相

我的论述仿佛走着一条倒三角的路径。最后说到的“贫穷”,这是刘醒龙小说中一个最无意识的背景,也是由作品带来的直观的第一感受,这本来应该是文章的第一部分的,不过竟因思绪如潮,被挤到最后来了。

偏僻大山里赤贫的生存状态,半倒闭小厂里拘谨的生活算计,是刘醒龙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背景。是啊,我们天生有幸,没